

# 晋察冀边区的群众动员<sup>1</sup>

张静

## 提要

共产党革命和国民党革命的一个差异，是前者依赖广泛的群众动员。而战事动员目标在新人员和粮草补充，执政动员的目标则是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。在认识到前方的战事顺利无法自动转化为后方的执政顺利之后，旨在争取“群众拥护”的新目标在边区确立。面对执政经验的空白，上个世纪 40 年代共产党在边区的临时执政，为其提供了实验和准备的场所。根据中央和地方局的工作组文件、边区各地“群众工作”的经验总结、整风和土地改革运动等党史资料、以及部分北方村史口述纪要文献，本文力图展现当时群众动员的困境、战略转变、具体做法及政治后果，说明共产党如何谋求党群利益切合，解决群众政治认同弱的问题。作为历史遗产，群众路线的这一起源影响了后来的身份政治分类标准：在政治上纯化革命队伍的阶级身份提上日程。

## 关键词

共产党革命 边区 群众路线 执政合法性 阶级纯化

## 问题

历史学者史华兹曾经提出一个引起争辩的观察：从中国共产党的兴起，到赢得政权的整个过程中，它不仅同城市无产阶级不存在紧密的关系，而且也不是由

---

<sup>1</sup> 本文最初以“解放区时期的群众路线”为题，在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“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”国际会议（2009 年 8 月）上宣读，之后经修改，在浙江大学公共行政学院主办的“民主制度与社会发展”研讨会上（2009 年 9 月）再次宣读。作者感谢黄树民和冯刚教授分别在两次会议上的评论。该文章曾刊登在《战略与管理》（内部版）2010 年 7/8 期。此处又经全面修改。



农民利益决定其政治抱负的“农民党”（Benjamin Schwartz, 1951）<sup>2</sup>。在经历了大约 40 年的研究进展以后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，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人，和他们的拥护者（农民）之间的目标，的确并“不存在自然的重合”<sup>3</sup>。然而，显而易见的事实是，农民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参与和支持者，我们要问，是什么、以及怎样使得本有不同目标的两个团体结合到一起，造就了“中共和他的敌人”都“始料未及的快速胜利”？（裴宜理，2001）<sup>4</sup>

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对此的回答是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，而西方学者则注重民族主义、实施土改、以及共产党的组织特点等因素的作用。但正如裴宜理所言，上述因素还不足以令人满意，因为在这些方面，共产党和国民党所具有的相似性超过了它们的差异性：“两党都是按照典型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建立的，都信奉民族主义及孙中山的革命计划，都拥护反抗帝国主义并支持实施土地改革，都致力于政府主导的工业化，都尊重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、北伐战争等革命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，也都在同样的暴力机器上运作”。裴宜理给出的新答案，是一种工具性遗产：共产党运用情感模式唤起百姓的方法（裴宜理：2001：2、27）。与此相关的研究也把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，看成是一种治理“方法”（马润凡，2005；张鸣，2009）。<sup>5</sup>

但，如果这的确是一种“模式”，为何在历史和现今都存在难以发挥作用的时刻？例如，山东地区 1943 年的群众工作复查报告坦承，地方党组织曾经“派很多干部下去，可是工作三四年群众也发动不起来”，在不少地方，干部屡屡受到群众的“白眼”和“冷遇”（朱瑞，1943：页 4）。<sup>6</sup>如果群众动员仅仅是治理方法，为何它在今天重现失灵？

为此，有必要再议当时“群众路线”的实践——它的本质原则到底何在？它针对什么问题出现？它究竟因何有效？追溯这些问题，不仅有助于再现群众路线的政治性涵义，更有助于反思，它的历史起因及对日后的影响。

<sup>2</sup> Benjamin Schwartz, *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*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51, 转引自梁怡, 李向前主编, 《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》, 中共党史出版社, 2006, 页 157.

<sup>3</sup> 梁怡, 李向前主编, 2006, 页 223.

<sup>4</sup> 裴宜理, “重访中国革命: 以情感的模式”, 李寇南, 何翔译, 《中国学术》, 2001 年 4 期, <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b0e793ed102de2bd960588d1.html>

<sup>5</sup> 马润凡, 1947-1949 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, 《党史研究与教学》, 2005 年 2 期。  
张鸣, 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——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（1946—1949）, 网易历史（<http://history.news.163.com/09/0629/07/5CV6PT0700013FLL.html>）

<sup>6</sup> 朱瑞, 滨海区农民一个月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检讨, 《山东群众工作经验》（党的工作参考丛书第五辑）, 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, 1943 年 5 月。



## 立足延安

毛泽东开始多强调群众路线起于延安时期，这一点值得充分注意。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驻地有 13 年。这是其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，唯一经历的时间较长、相对较少动荡的阶段。但其所遇的挑战十分艰巨：在一个贫瘠的山区，面对陌生而疏远的百姓，作为一个外来的临时政权，在经济上，它需要配给支持庞大的军政人员生存，在政治上，它需要百姓的守密和保护，而这一点依赖百姓对其“做事”的认同。

有一次，毛泽东和当地县长共同出席群众大会，他们相邻坐在主席台上。会议中突遇雷霆，一道闪电下来，炸雷击中了坐在毛身边的县长，他当场身亡，毛主席却毫发未损。之后有人在大街上议论，说雷公不长眼，没有击中毛而偏偏是县长。警卫队抓住了这个人要处死刑，但毛示不妥，要他们了解老乡为何这样说。在汉语里，雷劈议论等同于民间常说的“咒语”，但毛的反应令人回味。经了解，毛泽东得知群众有怨气，原因是太多军队在延安使得百姓负担加重。后来，延安部队开展南泥湾大生产运动，开荒过程艰辛，牺牲数千，但在政治上，自力更生粮食自给，保证了军政机构的长期立足，更成功降低了群众的不满。

另一影响巨大的事件，是处死红军团长的公审大会。红军一个立过战功的黄姓团长，向当地女青年求婚不成拔枪打死女方，很多军政要员为英雄说情免于其死。毛亲自写信给法院负责人，称虽然黄“过去的斗争经历光荣，我们为之惋惜”，但他的死刑“不能赦免”，原因是“他不同于一个普通的人，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，是一个多年的红军，所以不得不这样办。共产党与红军，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，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”（毛泽东，1937）。毛在信中要求法院不仅要判死刑，而且要召开公审大会，“宣读判决书，还要宣读我的这封信”，让百姓都看到我们“红军怎样办事”。<sup>7</sup>

1944 年 9 月，年轻战士张思德在事故中牺牲，毛要求开追悼会，并亲自出来讲话，号召掀起一场“学习张思德运动”。张死于烧木炭发生的塌窑意外，而这些木炭，惯例上是给干部土窑过冬而备。但这场学习运动的主题，并非是学习张为干部服务，而是学习他“为人民服务”。毛在他的纪念稿中论证，张思德是

<sup>7</sup> 毛泽东，1937 年 10 月 10 日写给延安法院的信。资料来源：延安抗大纪念馆手迹原件展品。



为人民而死的，因为我们的事业是为人民的。

这些事件有共同特点，它们都涉及战士和干部，百姓和军队，群众和党的关系。可以看到，毛总是要求开大会，向群众公示办事原则，他尤其在在意群众怎样看干部/军队和党组织，绝不容上述关系被毁。因为这些关系是党的生存前提，“如果有人去通风报信，就会引来对延安的轰炸”。<sup>8</sup> 毛泽东非常清楚，如果群众不喜欢他们，中央和军队就难以在延安立足。

### “致命”的东西

作为实践，群众路线的大规模展开是在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改革时期。从四十年代开始，中国共产党在其控制的解放区陆续实行土改以及减租减息运动，在晋冀鲁豫地区，中央各地方局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深入乡间，领导并组织这一工作。工作组很快发现，土地改革“果实”的分配并不能直接带来政治拥护。在不少地区，基层工作遭到群众的白眼，华北尤其是山东动员组织群众的工作，实际上面临不少“失败”（朱瑞，1943，页23）。

“失败”是指果实分配后群众中仍存在大量不满。一些地方的群众对下乡干部产生怀疑，不知他们整天“秘密”开会在干什么，还有群众对基层组织的作风严重不满。工作组在各地调研发现，干部“不受群众认可”，成为“致命”的东西。<sup>9</sup>

关键的问题在干部和群众的目标和利益不一致。这表现在：其一，干部不了解农民群众的需求，“想当然以为我们的需求就是他们的需求”。不了解群众的具体要求是什么，也不知“从一些什么要求上走近群众”，结果他们“碰了壁，遭到群众的白眼”（朱瑞，1948，页8）。其二，基层工作“封锁上边，统治下边”，干部对群众的捆、罚、骂非常严重，群众称他们是“一窝蛰人的蜂”。在上级眼中越是好的支部，反而问题越多，因为他们执行上级指示得力，但群众却疏远他们。有的地方组织以争功为目的，满足于上交表格，希望上级机关奖励自己的功劳，而没有想到，一切的功劳，是必须经过群众批评才算的（陈伯达，页26）。

<sup>10</sup>其三，与群众争果实、占利益。在基层村乡，干部往往设有庞大的合作社，囤

<sup>8</sup> 延安展览解说词。

<sup>9</sup> 无作者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，《土改与整党文献》，中共辽东区党委宣传部编印，民国三十七年八月，页2。

<sup>10</sup> 陈伯达，有事和群众商量，《群运手册》，华东中央局宣传部印，无出版年。



积清算上缴的果实，包括剥夺地主的金银细软土地房屋等。这些果实名为是群众的，实为少数干部把持，连年不分红也不报账。其四，不能代表最广大群众的利益。“基层工作干部在提出工作口号后，没有观察群众的反应，没有掌握哪些人拥护，哪些人反对，没有找到真正的贫雇农，真正的积极分子，而是依靠了那些假装积极的投机分子，找错了人。”结果是“主观上为群众谋利益，群众反倒不喜欢，甚至反对我们……”，“贫雇农怨干部不管，地主笑干部傻瓜，大佃户嫌干部多事，谁都不满意，群众工作走岔了道”（朱瑞，1943，页11）。<sup>11</sup>

针对这些问题，工作组日后总结认为，症结在于干部所为并非是群众所想所要：

“我们所犯的错误，究其发生的原因，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，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。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”。<sup>12</sup>

为了将群众和党的目标一致起来，工作组开始在各地尝试改变工作方针：首先解决群众迫切的临时要求，才会“走得通”——比如在土匪猖獗地区的防匪，冬春期间的救荒，新开辟区的减轻合理负担，惩治贪污，反对坏蛋，战时的反扫荡，边区的反蚕食等等，……为满足这些群众要求，工作组将减租减息工作放缓，在有的地方，要把这一工作的“部分、甚至全部放到一边去”。同时，对干部多分多占的行为实行“洗脸擦黑”，政府部队机关团体退出多分的财富，让干部把多得的土地财产让出来。

然而，这么做遭遇到极大抵抗。人们议论说，上边“卸了磨子杀了驴，过河拔桥”（薄一波，页17-19）<sup>13</sup>。基层工作因此面临尴尬局面：如果不搞退产，群众不满，但如果搞的严了，又影响干部的工作情绪（1948，页39）。<sup>14</sup>他们的情绪发展为对群众的报复行为，上级不得不两次下来调解干群关系，但“最后还是领导上给干部撑腰做了结局”。结果群众更不敢说话了，地方局的工作组进村后，

<sup>11</sup> 朱瑞，海滨区一个月农民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检讨，中共中央北方局局出版，《山东群众工作经验》，1943。

<sup>12</sup> 无作者，1948年4月1日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，《土改与整党文献》，1948，页3。

<sup>13</sup> 薄一波，晋冀鲁豫解放区贯彻土地改革的经验——复刘少奇同志的信，《群运手册》。

<sup>14</sup> 遵县通讯，农村民主问题，《土改与整党文献》（第二集），中共缪东区党委宣传部编印，1948。





群众态度多是不信任和避讳（1948，页28）。<sup>15</sup>

## 整党

针对上述问题，当时采取办法不是改造群众，让群众和干部保持一致，而是改造干部队伍自己，使之能和群众保持一致。这是土改时期整党运动的由来：让干部“再也不敢厉害，再也不敢贪污”，“再也不能仗势欺人，不能侵占群众利益”。

16

整党第一阶段的目标，是找到群众不满、反对干部的缘故。为此，工作组一进村，就一头扎到贫雇农、中农和普通党员家里，挨家进行个别访问，征求他们对过去工作和干部的意见。摸清群众对干部的基本看法后，工作组召开党内支部会议，和干部讲清整党和填补（政策纠偏，给土改中未获得合理分配的群众重新进行填补分配）的意义。尤其是“说明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性”，告诉他们，过去支部脱离群众的错误，部分要由上级负责：对党员教育不够，分配任务不合实际；部分则要由党员个人负责：一些党员损害了群众利益，现在“要解决这个问题”。

“有了思想准备，就召开群众大会，在会上把党员的名单全部公开。……过去只公布了几个好党员，这次要全部公开。坏党员虽然不愿意，但知道这次不整不行。……要说明党员应该干些什么，请大家看看过去三个村的党员是不是这样。……乱斗了的要改正，多得果实的要退，没有翻身的要补，错分的要补价……”。<sup>17</sup>

工作组鼓励群众大胆提意见，承诺给群众“撑腰到底”，让有错误的党员反省交代。这些交代涉及干部多分多占、私拿瞒报、近亲提干等行为。根据1946年山西张庄的档案记录，当时的副大队长赵贵才承认：

<sup>15</sup> 无作者，武安九区试行整党/民主/填补运动点滴经验，《土改与整党文献》，（第二集），中共冀东区党委宣传部编印，1948。

<sup>16</sup> 无作者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，《土改与整党文献》，第二集，中共冀东区党委宣传部编印，1948，页1-2。

<sup>17</sup> 无作者，武安九区试行整党/民主/填补运动的点滴经验，《土改与整党文献》，1948，页30。



自己对小家庭生活考虑的太多,经常以多记工分来补足自己的生活,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发展,严重到私拿行为。自己拿过公家的洋钩一个、洋条绳一条,大队油3斤,布票6尺,肉1斤,五队红薯150斤,三队红薯30斤,油1斤,瓜、豆角、白菜合50斤。<sup>18</sup>

党员干部退出了这些(经济)果实,结果赢得了“政治果实”:群众看到了实际行动,服气又“感动”。有了这种气氛后,再让群众参与财产的抽仗和抽平工作:对群众认为不公的分配,重新进行丈量和评断。各村的支部会邀请群众代表参加,让党员申辩哪些是自己的错,哪些是群众的误会,哪些是党员自私所致,哪些是上级政策应当负责的。最后由群众代表给干部做鉴定,再经上级批准,宣布对有错党员的处分。工作组发现,这些实际做法,群众“是满意的”。<sup>19</sup>

抗战时期不少家庭中有人上前线,这些地方土改分果实时,曾分给军人家属(称为“抗属”)好地好财和好房,并由在乡的其他农户代为耕种。这一政策招致群众不满,不少人拒绝出力。整党中抓住这一问题,在前线部队广泛动员军人写信回家,说服家属退回多得的土地,以配合“目前改造党的步骤”,解决革命是为自己发财还是为人民服务的问题(薄一波,页18)。<sup>20</sup>……“使党提高一步”。<sup>21</sup>同时,在后方乡村,开始重新确定抗属应得的土地标准,由群众分组讨论具体办法,制定出代耕的人力畜力标准,再召集群众大会通过。这样做了之后,后方乡村的群众情绪转变,由“腻歪”变成“痛快”。<sup>22</sup>

接着是纯洁队伍,清理“坏党员”:这些人作风很坏,还有些是老党员,过去在革命中有功,打仗很勇敢,但如果村里群众都说他坏,脱离群众如此严重,即便过去有功,也必须清洗(习仲勋,1948)。基层党组织需要“成分好又为群众拥护的人”,不能用敢干的流氓,也不能用成分好的老弱病残,“要找那些与群众有联系,有信仰,有办法,有经验的分子,党依靠这些分子与群众联系。”那

<sup>18</sup> 山西张庄村档案,干部反省检查记录,1946,编号zz-30-2-1,复印件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。转引自邓宏琴,“反省:集体化时代塑造乡村干部群体的运作机制”,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国际会议论文,2009年7月。

<sup>19</sup> 《土改与整党文献》,1948,页36。

<sup>20</sup> 薄一波,晋冀鲁豫解放区贯彻土地改革的经验,《群运手册》。

<sup>21</sup> 华东区对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,《群运手册》,华东中央局宣传部印,无出版年,页9。

<sup>22</sup> 河间东方村抗属生产:由三腻歪变成三痛快,《群众路线研究》,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印,民国36年。



些指派的干部、或者只经过形式民选的干部，常常不是真积极分子，他们离间了党和群众的关系，依靠这样的人使党的事业“很危险”。<sup>23</sup>

很明显，土改整党中特别追求的效果在政治方面：改变群众对干部/军人和党员的看法，解决他们的在目标和利益上不一致的问题。土改整党在各地虽然深度不一，但都是针对当地群众的不满进行“纠偏”，通过补差、抽仗、抽补、查账、改造、清理、并清退多占经济果实的做法，图消除对立隔阂的“政治果实”，让党员干部重获群众的拥护，避免限于孤立：

“要根据群众的意见来改造我们的各级干部和组织，运用群众力量大力压迫，取得充分材料证据，要干部退出多占果实，改变作风，以便重获群众拥护。……如果先进分子的意见没有取得群众的同意和拥护，就会陷于孤立”（陈伯达，无出版年，页34）。<sup>24</sup>

## 临时农会

上述做法主要在调整干群之间的土改财富再分配。但是，中央工作组在土改复查中发现，有些问题不是来自经济方面：虽然“群众翻了身，但情绪不高，对干部还有意见”；一些地方干群矛盾还是很深，干群之间“不通气”；一些地方党员把持大权，有了事情就开密会，而后命令群众去做。结果即使支部决策是正确的，群众也不愿意，他们怀疑支部是“暗部会”。工作组下乡解决干群矛盾，召开干群“团结大会，鼓励互相批评”，但效果欠佳，群众不敢说话。工作组意识到，问题的原因在于群众还不是主人，他们不过是“被”分得了果实。群众不仅要在经济上翻身，还要在政治上翻身，必须“让群众成为有决定权的主人，改变干部为主人的现实”（刘少奇），<sup>25</sup>光给他们分财产还不够，还要让群众说话，这样才能显示共产党和从前的国民党不一样：

“（要对群众）说清以下几点：过去咱村办公的是国民党，专门给地主豪绅

<sup>23</sup> 无作者，土地改革中的群众路线问题，《群众路线研究》，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印，民国36年，页1-4。

<sup>24</sup> 陈伯达，有事和群众商量，《群运手册》。

<sup>25</sup> 刘少奇，介绍晋冀鲁豫土地改革经验，《群运手册》。





办事，不让老百姓说话，人们也不敢怎样他们。现在的村干部都是共产党，不一样了”。<sup>26</sup>

为了增加群众信任，“不开密会”—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务公开——成为一个新政策：公开处于地下工作状态的支部和党员名单，接受群众监督；让群众看到、听到、参与到各种事项的讨论中；人事问题让群众说了算，由农民选举代表组成的农会来决定；“哪个干部要不要，不决定于公家人，而决定于群众”。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的“告农民书”这写道：

“不管任何一级，从村一级到边区一级的干部，共产党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，有监督、审查、批评、处罚、表扬、教育的权利。该批评的，该斗争的，该处分的，该撤职的，大家都可以批评，可以斗争，可以处分，可以撤职。如果是共产党员，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，也可以由大家提出意见开除，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部批准。……就是真正由战斗部队退伍下来的，如果他横行霸道，为非作恶，也可以由大家教育处罚，取消他的优待资格。……”<sup>27</sup>

临时农会号召农民对几项事情“负起责任”——对农会和政府组织的改造责任：改造各级党政军机关，审查和整理民兵、八路军队伍；对共产党的推荐责任：推荐好农民入党，“把共产党搞成更好地为农民办事的党”；对政府机关的选举责任：选举大家“愿意选的人到各级党政机关为大家办事”；……“凡是那些不替农民办事的人掌握政权的地方，农会就可以完全代替政权”。<sup>28</sup>

对那些将信将疑，不相信自己真有这么权利的群众，临时农会鼓励大家：

“过去很多人有顾虑，……怕干部报复，怕纠正。现在不用顾虑了，因为咱

<sup>26</sup> 九地委，肃宁尹庄从思想上整组的经过及经验，，《群众路线研究》，页 21—22。

<sup>27</sup> 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，《土地问题指南》，西北局宣传部编印，1947，页 63。

<sup>28</sup> 同上，页 62-63。



们……有权管理和撤换干部，不怕了！过去有些‘纠正’的确是错误的，如今共产党已经检讨了这个错误。”<sup>29</sup>

“为自己办事”的组织——农会成立的具体步骤是：在农民中培育积极分子；由积极分子找人建立农会的筹备组织；新组织的第一次会议，讨论要不要建立农会，谁可以加入农会，要不要介绍人，要不要大家通过，如何发展农会会员，如何推举农会会长。筹备会议的负责人由大家推选。而后以贫雇农为核心成立农会，逐步扩大会员，通过农会行事章程。到时机成熟有把握时，召开干部、农会、农民代表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。农会的职责是决定大家关心的事情，比如分田的方案。具体分配方案经过群众充分酝酿——先分几个组分别提出方案，然后交换小组讨论，反复讨论数次，直到大家都满意为止。方案待各组群众都通过以后再分田，分后由群众推代表，建立“果实分配评议委员会”。对干部分得的果实要公开列单，叫群众讨论，看他们是否同意按照成分和政治条件分。总之，“农会、贫农小组，工作组三者结合，即成为土改中群众路线的具体形态。各级党组织应把大权授给他们，去进行土改……”。<sup>30</sup>

### 战场之外的政治竞争

群众路线作为政治战略的重要性，并非各级干部都有的认识。在解放区基层不少党员干部头脑中，这样的想法普遍：江山靠的是流血流汗和生命换来，靠打胜仗赢得，群众因此受到我们的益处，又为何需要争夺群众？部分从作战部队下来的干部，自视在前方有功，傲慢无礼，指挥指使。

“一些干部站在群众头上，轻视做群众工作的干部为“第四等”干部，称群众工作干部为“民运二哥”，区工作干部被当作通讯员差遣；随便调走群众干部，不给群众工作独立性和民主性，由党包办，政权干涉，随便调动群众干部，命令

<sup>29</sup> 同上，页 64。

<sup>30</sup> 华东局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，《群运手册》，页 8-9。



他们催给养催公平负担”。<sup>31</sup>

与基层状况不同，中央工作组则充满“失去群众”的危机感。这种危机感可以发现在所有文件的字里行间。他们告诫，只拿到政权，不是真的胜利，满足于掌握政权，是没有基础的、形式的、非持久的、非真实的假胜利：

“有人说，用军队和政权的优势，在合法权力的慑服下，不用经过斗争也可以胜利，但这种胜利是假的，形式的，非真实持久的。”……

因为，“这种脱离群众的胜利，自然会让他们（群众）想到（好处）是人家给他们的，……但被动地看不见自己的力量，也不相信自己，只依赖八路军与政府。有的青山在则一切都好，如果遇到困难，假如军队或政府受到打击缩小或塌台时，群众如何依赖军政？这时就会发生动摇。所以这胜利是假的，我们失去了真正的组织与依靠群众的胜利，这是非常危险的”。<sup>32</sup>

失去群众主动真心的拥护，就会使胜利无法持久稳固，就会在政权面临危机时失去根据地，这一政治危机感是当时“群众路线”取得战略地位的关键。这种危机感来自战争“拉锯”时期乡村工作的经验：赢得人心，消除陌生感，认同党的领导和执政——这些并非是前线打胜仗的自动结果，也不是财富再分配的自动结果，赢得政治支持还须通过寻求农民的利益、释放他们的政治权利而来。基于这种认识，在军事战场之外，一场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竞争——赢得民心对执政的认同——在边区广泛展开。应当说，群众路线是这一政治竞争的产物。

在群众工作的组织架构方面，需留意工作组的角色：桥梁角色——在中央决策和基层群众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；信使角色——将群众的需要和要求信息，传输到决策团体；总结经验和政策建议角色——根据实际情况，提出改变政策的建议。在边区，群众工作的大量经验由工作队总结上达，他们与大区局的领导工作联系非常密切，使上级可能及时作出反应甚至战略转变，随时调整不为群众接受的工作目标。显然，上述做法的政治性后果是，有效寻得了革命领导团体和农民

<sup>31</sup> 黎玉，减租增资的策略问题，《山东群众工作经验》，1943，页39，40。

<sup>32</sup> 黎玉，减租增资的策略问题，《山东群众工作经验》，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，1943，页21—22。



利益的重合点，解决了农民对新政权执政的认同问题，从而促使他们变成共产党的支持者和革命者。

## 讨论

“群众路线”是对战争环境中政治竞争现实的反应，这一起因使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——了解和满足多数群众的需要和利益，以取得他们对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。群众路线旨在解决的核心问题，是争取群众对新政权的认同，最大程度地降低党和群众发生隔阂的“危险”。可以说，面对特殊环境下的政治竞争现实，群众路线作为回应战略，来自于党的政治生命之危机感，或可称为（中国式的）“执政合法性”之考量。

这决定了群众路线的本质原则：寻求党群在目标和利益方面的一致性，弥合并调整不一致性。在边区土改中，当群众工作符合这一原则时，发动群众就相当成功，偏离这一原则时，就困难重重。这些“利益”，具有经济（果实再分配）、政治（选择和监督权设置）、以及社会（地位结构变化）内容。经由边区整党，共产党不断约束自己的基层组织行为，并随时根据群众的反应调整偏差，直至被群众认同。经由“群众路线”，共产党在边区土改中完成了对政权支持基础的建造：人群辨识、利益分配、权利释放、开放领导位置吸纳群众代表（积极分子）。这些做法在党的局部执政区，以区别于旧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实验，展开与国民党政府的人心竞争。它是一场枪炮之外的政治战争，原因在于，在枪杆子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，只有满足群众需求和利益，才能解决对执政者的政治认同问题。共产党在这一竞争中的成效，为其巩固地盘、扩大战果、赢得人力物力资源、并快速取得全局性的胜利，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。

与此相应地，用阶级出身在群众中辨别“敌友”，辨别“坚定的”支持者或“动摇派”，……都大规模地开始于解放区的群众运动，这开启了在革命队伍中纯化阶级身份的进程。而在此之前，阶级的区分并没有那么凸显，早期被接纳到共产党队伍中的人员背景，单一“穷出身”者并不显突出。例如，1938年统计在册的延安抗大约4000名学员中，他们的“家庭成分”分布耐人寻味：其中贫雇农占36.5%；富农、官宦、资本家及地主占22.2%；中农及城市工人占37.3



%；城市手工业者或其他占 14%。<sup>33</sup> 众所周知，这些学员被认为是日后党政军的骨干力量和后备干部。

问题在于，由于群众路线是竞争政治环境下的产物，针对的是具体、当前面临的危险。这一特质，使其明显带有“工具”烙印，用于处理紧迫的政治问题，需要时就用，不需要时就被搁置。它的使用重点在修补（已经发生的问题），而非预防（防止发生问题），并且停留在倡导认识的层次上，未被推动成长成为一种防备机制，更未被制度化地巩固为一种体制的能力。遂在环境发生变化，政治竞争减弱或危险消失的时候，群众路线就失去了持久被需要的生命力，难以持续地发挥其防止“致命事情”的政治功能。

---

<sup>33</sup>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员简况统计表（1938.7）。资料来源：延安抗大展览馆展品。





## 参考文献

《山东群众工作经验》（党的工作参考丛书第五辑），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，1943年5月；

《群运手册》，华东中央局宣传部印，无出版年；

《群众路线研究》，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印，民国36年6月；

《土改与整党文献》，中共冀东区党委宣传部编印，1947年；

《中央关于对开明绅士政策的指示》，1948年3月2日；

《土地问题指南》，西北局宣传部编印，1948年10月24日；

《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（草案）》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秘书处印，1948年2月15日；

《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》（上下册试用本），延安：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，2008；

黄宗智，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——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，<http://www.wyxsx.com/Article/Class14/200409/546.html>；

马润凡，1947-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，《党史研究与教学》，2005年2期；

张鸣，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——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（1946—1949），网易历史 <http://history.news.163.com/09/0629/07/5CV6PT0700013FLL.html>；

邓宏琴，反省：集体化时代塑造乡村干部群体的运作机制，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国际会议论文，2009；

梁怡，李向前主编，《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》，北京：中共党史出版社，2006；

王友明，《革命与乡村：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》，上海：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6；

荣敬本等，《论延安的民主模式——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研究》，西安：西北大学出版社，2004；

Mark Selden，《革命中的中国：延安道路》，魏晓明，冯崇义译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2；

E.裴宜理，重访中国革命：以情感的模式，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工作论文，2011，3：<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b0e793ed102de2bd960588d1.html>；

许纪霖，宋宏编，《史华慈论中国》，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06。

